

学林出版社

欧阳文彬

書緣

● 湖峰上的浪花

——上海散文创作印象记

● 海棠花下

——纪念叶圣陶先生和老友的最后

● 打开文艺宝库的钥匙

——《叶圣陶论创作》编辑、学习札记

● 教师写的小说叫好

● 幸福与爱情的颂歌

——谈《前夜》中的

叶琳娜和英沙罗夫

SHUYUAN

● 《中学生》忆旧

● 在烽火中诞生的《文化线》

● 张天翼老师二三事

● 读程乃珊作品随想

● 遗爱在人间

——怀念夏丏尊先生

书 缘

欧阳文彬 著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曹坚平

封面设计：王 俭

书 缘

欧阳文彬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 120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句容县排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36,000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,200

ISBN 7-80510-625-8/I·217

定价：2.75 元

目 录

我与书	1
-----------	---

——写在前面

第一辑 回忆与怀念

《中学生》忆旧	3
---------------	---

从《中学生》的特色谈起	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遗爱在人间	17
-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怀念夏丐尊先生

一切为读者着想的傅彬然先生	39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我所知道的宋云彬先生	44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广告中的学问	47
--------------	----

书店工作放谈	51
--------------	----

回忆是为了更好地前进	5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在烽火中诞生的《文化线》	6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亚美图书社始末	67
---------------	----

艺苑因缘	77
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记叶老与林熙的友谊

怀念叶老	81
------------	----

海棠花下	84
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追记叶圣陶先生和老友聚会

张天翼老师二三事	87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书林翠凤	94
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访优秀书店营业员谢翠凤

第二辑 编书与评书

打开文艺宝库的钥匙	10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《叶圣陶论创作》编辑、学习札记

第一读者的感受	11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《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》编后

白马湖畔的寻觅	12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《夏丏尊文集》编辑手记

读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有感	13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关于《图腾艺术史》的对话	13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读程乃珊作品随想	138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关于几个中篇的对话	147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为教师写的小说叫好	154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读《少年文艺》“教师作品辑”有感

喜读几篇微型小说	159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潮峰上的浪花	162
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上海散文创作印象记

如坐春风	171
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读《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》

“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侏儒”	17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读《罗亭》笔记

理想与爱情的颂歌	184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谈《前夜》中的叶琳娜和英沙罗夫

克利斯多福·纽笔下的上海	19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 与 书

——写在前面

我从小爱看书。大字识不了几个的时候，就能捧着《看图识字》或者连环画书，一坐几个小时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上小学后，我经常光顾街头的小书摊，拿着从早点费中省下的几枚铜板去租书看；并用羡慕的眼光仰望书店的店堂，萌发了将来进书店工作的最初愿望。念初中时，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和“开明青年丛书”成了哺育我成长的第二课堂。读高中时开始接触在同学间辗转传阅的《生活》星期刊和信箱汇集等进步书刊。抗战爆发，流亡失学之际，首先投奔的是曾经为我引路的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。这几家进步书店遭到反动派查封后，我又转入了早年哺育过我的开明书店。解放后，工作虽然有所调动，却从未离开新闻出版这个圈子。在半个世纪的书业生涯中，我当过营业员、广告员、校对、编辑，干得时间最长的是编辑，一直干到年近古稀。就这样，从读书、卖书、推销书到编书、评书、写书，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回顾我这大半辈子，主要做了三件事，就是：读书、编书、写书。职业当然是编辑。爱好则首推读书。且不说编辑这一行必须不断地汲取新知，实际上每编一本书都是在享受对书稿先睹为快的权利，或者说是充当第一读者。再说写作，也

可说是读书的产物。例如文艺评论，我就是把它当作读书笔记来写的。就连创作，也往往是在读书中有所触动，激发了自己动手的愿望，然后进入创作过程的。即使撇开这一切，读书也不会停止。它对我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需要。换句话说，在今后的有生之年，仍然要继续和书打交道。

我忘不了生活、新知、读生三家书店（后合并为三联书店）的革命书籍给我的思想启蒙，和我在生活、新知工作期间受到的斗争锻炼；我也忘不了开明书店《中学生》杂志和夏丏尊、叶圣陶等前辈编辑对我的教诲和熏陶。正是这种深切的感激和怀念之情，促使我记下了亲身经历的书林旧事和几位前辈的感人事迹，现在把它们编入第一辑《回忆与怀念》。

我最初学写书评，是为了向广大读者推销好书，并没有料到以后会在这块园地里耕耘。在漫长的编辑生涯中，我不断体会到第一读者的幸福，也曾写下自己的感受与一得之见。第二辑《编书与评书》选收的是近十年所写的笔记。

1990年5月

《中学生》忆旧

从30年代开始念中学的青年，很少不知道《中学生》杂志的。可是如今30岁以下的青年，知道这个杂志的只怕就不多了。因为这个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艰苦创业，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坚持出版，为广大青年学生服务了30多年的刊物，和其他许许多多刊物一样，也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被迫停刊，和读者睽别十几年了。

《中学生》创刊的1930年，我还是个小学生，所以并不是它最早的读者。但它却是我少年时代接触最早的一种刊物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的家和《中学生》编辑部一样毁于日寇的炮火。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，曾经走着和《中学生》同样的途程，在桂林、重庆成为它的作者，回上海后又一度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，因此也算得一个老朋友了。

最近欣闻《中学生》即将复刊，《读书》杂志又要我写写《中学生》的情况，记忆之舟就把我载回到那遥远的过去——

我在中学时代，同时上过两所学校，一所是正规的中学，每天按时上课、下课、做作业；一所就是《中学生》杂志，课外阅读，使我废寝忘食，爱不释手。大凡学校里的课程，《中学生》里几乎都辟有专栏。这里的老师们虽然没有见面，文章都写得亲切生动，引人入胜。我本来感到枯燥的数理、生物，读了

刘薰宇、顾均正、贾祖璋的文章，只觉得趣味盎然。我本来比较喜欢的语文、艺术，读了叶圣陶、夏丏尊、丰子恺的文章，更觉得美不胜收。《中学生》独创的“文章病院”，专门收治有弊病的文章，分析解剖，指出错误，使读者举一反三，知所纠正。对于当时象我这样初习作文的学生，非但起了预防疾病的作用，而且上了端正写作态度的一课。

《中学生》的老师们为我们打开一扇扇明亮的窗户，让我们看到知识海洋的广阔和瑰丽，还领着我们涉猎，教给我们正确的学习方法，反对在中学生中提倡读经、宣扬复古，反对记诵教育、食而不化，主张联系实际，在实践中求得真长进。这种学习经验的传授，使青年读者受用无穷。

《中学生》的老师们不仅关怀青年的文化学习，也关怀着青年的思想发展。他们曾为“徬徨于纷叉的歧路，饥渴于寥廓的荒原”的数十万中学生呼吁，并在给作者的约稿信中恳切地写道：“假如在你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，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，你将对他做些什么？”

这一切，又并不是用教训的口吻说出，而是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。通过这一切，我渐渐地对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们有所了解，从治学态度到工作作风、人生态度，都是那么认真、踏实、稳健。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甚至超过了学校里的老师。我多么希望见见这些老师，甚至曾经揣摹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会是什么模样，什么神态……

我第一次见到《中学生》的编者，是1941年，在号称“文化城”的桂林。《中学生》迁到这儿，从大32开改为16开本的战时半月刊。我原在桂林新知书店工作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

事变,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,广西政治形势更为恶化。桂林生活书店首先被当局“限期停业”,这显然是加紧迫害进步书店的信号。新知书店在广西几位上层民主人士的协助下,赶在国民党反动派下手查封书店之前,把门市部折价转顶给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文化供应社,原有工作人员大部转移过去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这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,保存进步出版力量的一种对策。那时候邵荃麟、傅彬然、宋云彬等都在文化供应社工作。邵荃麟主编《文化杂志》,傅彬然负责编辑部,宋云彬负责出版部。傅彬然和宋云彬还兼着《中学生》的编委。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们,心情自然分外激动。

我很快发现,《中学生》变了,随着时代的浪潮变了。如果说初期的《中学生》偏重文化学习而兼及思想启发,那么,战时的《中学生》已把重点从文化学习转到思想政治方面,着重于团结抗日、民主进步的宣传。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环境的限制,《中学生》不得不采取“稳健”的姿态,但立场一贯是站在进步方面。皖南事变后,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地倒打一耙,反诬新四军“叛变”,同时严密封锁报刊消息,不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。《中学生》发表的宋云彬《抗战四周年的回顾》一文中,却提到“本年春间,江南发生了不幸事件”,向读者透露了消息,表明了态度,向国民党反动派抗议,也是舆论界的一个胜利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桂林《中学生》杂志社原先是没有设编辑部的,社长叶圣陶远在四川,傅彬然、宋云彬都是兼职,负责约稿、看稿,只有另一个编委唐锡光在开明书店负责编排、出版,后来才增加了覃必陶、王知伊,组成编辑部。傅彬然喜欢把文化供应社的一些年轻同事叫做“青年朋友”,和《中学生》杂志上对读者们的称呼一样。因此,我们听到傅先生这样称

呼我们，也就感到十分亲切。傅先生对我们这些青年朋友，确是真心诚意地关怀培育。他看到我自学英文，就把《莫斯科新闻》上的文章交给我试译，又把我的译文拿去请人校正后在《中学生》发表。他为了鼓励我写稿，还经常找一些读者提问来叫我解答，写好后在《中学生》发表。这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。为了翻译，先要弄通原文，还要锻炼中文的表达能力；为了解答问题，先要自己理解，还要力求说服别人。傅先生对于我那些靠查字典翻出来的译文，靠抱佛脚写出来的解答，从不厌弃，而是耐心批阅，细心辅导。我就是这样在傅彬然先生帮助扶植下成为《中学生》的作者的。

1945年，我以青年作者的身分，受到了《中学生》主编叶圣陶先生的接见。湘桂撤退以后，许多文化团体都撤到重庆。《中学生》编辑部就设在重庆开明书店楼上。在初期《中学生》那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中，叶圣陶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。然而闻名不如见面。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，那一身长衫、一双布鞋，朴实大方，完全是民族气派；那一对长眉、一副短须，完全是长者风度。特别是那长而浓的眉毛，覆盖着若有所思的眼睛，显得十分庄重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寿眉吧！还有那沉稳的表情，谦和的神态，处处让人感到这正是《中学生》的风格。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，因为天热，还扎了两根小辫。面对着这样一位私淑已久的长者，不免有点拘谨。至于叶圣陶先生，对于象我这样的青年读者，自然见得多了。他说话不多，傅彬然先生向他介绍我的情况，他只频频颌首。此外就是鼓励我多写。

这次会见后不久，我进开明书店当了校对。按照开明的惯例，吸收到编辑部的青年，一般都先做校对。因为这项工作可

以培养认真负责的作风，练出一些基本功。校对组和《中学生》编辑部同室办公。我发现叶圣陶、傅彬然先生都兼管整个书店的编审工作，专职编辑只王知伊一人，除约稿、发稿以外，还要处理来信来稿，编发“读者之页”。叶、傅两位对刊物抓得也很具体，审稿严谨，特别在文字方面非常审慎。我看《中学生》的校样，看到叶圣陶先生的原稿写得干净整洁，从不乱涂，字迹一点一划，一笔不苟；青年读者被选用的原稿，也大都经他亲自审阅批改，尤其是我自己的稿子，经他审阅批改，一些潦草的字他还用墨笔替我描工整了，往往使我羞愧脸红。我过去写字一味求快，有的笔划只是带过算数。此后虽然有所改进，总没能做到象叶圣陶先生那样工整。

我以前确实想不到，这个在广大青年读者中享有崇高威信刊物，编辑部里人手竟会这么少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正是《中学生》的传统之一。从30年代初创时期起，编辑部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负责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《中学生》复员回上海，有一段时间，专职编辑王知伊另有任用，由我接替他的工作，先后协助傅彬然、张明养先生处理日常编务，得以对《中学生》编辑部的前辈们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他们是实际的教育家，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，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，以青年为朋友，“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，共同作‘长期的锻炼’，共同‘担当’那‘艰巨的工作’”，“共同在此时此地的人生大道上前进”，并且“只觉得融和在青年的队伍里是我们的安慰，跟并世的青年们心心相印是我们的欢快，所以不怕阻碍跟困难，宁愿干这个事业。”（叶圣陶为重庆《中学生》写的“卷头言”）

他们是热忱的事业家，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，而是脚

踏实地，以身作则，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，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，对可用的稿件热情支持，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，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。方向明，层次少，审稿快，效率高。一切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

他们是认真的实干家，相信一切学问行为最要紧在养成良好的习惯，编发稿件不允许有错字漏网，也不允许延误时间。刊物出满200期时，叶圣陶在《本志的宗旨与态度》中特为写了一段话：“出杂志，标明月刊，每月某日出版，就是与读者诸君订了契约，如期出版是守约，后期即失信。守约是人间的起码道德。”（见1948年6月号《中学生》）

1949年1月，叶圣陶、傅彬然先生离沪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，上海《中学生》由张明养先生主编。叶、傅两先生到北平后，为纪念解放战争胜利，马上创办了《中学生》的北平版，改用《进步青年》刊名，这显示了他们热忱于事业的闲不住的精神，也显示了他们随着时代和青年们共同前进的愿望。此后，我由于工作调动，离开了《中学生》。他们对我的教导和影响，却一直印在心中，未敢或忘。

有趣的是，在不久以前，又有机会见到叶圣陶先生时，我自觉已经步入老境，他却给了我一个鹤发童颜、青春焕发的印象。这次晤面，距离1945年的首次会见已有30余年。年逾八旬的叶老，精神矍铄，口若悬河，比当年健谈多了。言谈中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浓烈的兴趣，听来令人振奋。叶老过去常说：“自信还有青年气概。”至今依然。一个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的人，是不会老的。

1979年9月

从《中学生》的特色谈起

我的编辑生涯是从《中学生》杂志开始的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刚进杂志社,主持编辑工作的傅彬然先生就谆谆教导我说:“要时时刻刻想到读者,想到杂志是办给中学生看的,发表的文章要符合中学生的水平和实际需要。”三句话讲的都是读者对象。我当时以为这是不成问题的。因为早在30年代初期上中学时,我就爱看《中学生》杂志,自信对中学生读者还是有所了解的。经过一段实践之后,才逐渐体会傅先生这几句话中的深意。

任何一个杂志都有自己的读者对象。杂志能否办好,和读者对象是否明确有很大关系。但明确读者对象并不是凭着良好的主观愿望,或者发表一通漂亮的宣言就可以做到的。在编辑过程中,往往会遇到各种情况,使杂志偏离甚至违背读者对象的需要。傅先生给我上了杂志编辑至关重要的一课。

“时时刻刻想到读者”,决不是一句空话。首先,选择什么样的读者作为对象,就不应是随心所欲的。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历任主编夏丏尊、叶圣陶、傅彬然等先生都曾在中学任教多年,对中学生的状况比较了解。实际的教学经验又使他们深感旧教育制度的不合理,片面强调记诵,只能让学生“受教材”,得不到真长进。他们办杂志的宗旨在于:使“教材”象食物一样在学生体内消化,生出新的血肉。由此决定杂志的态

度不是教训,而是辅导,和青年读者站在平等的地位,以朋友的身份从旁指点,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知识领域,启发他们自己去吸取营养,并在实践中学会运用。这正是《中学生》杂志为读者着想的具体表现,也是它不同于其他青年杂志的地方。

为杂志定一个宗旨,表一个态度,不算太难,难的是切实体现这一宗旨,认真坚持这一态度。《中学生》杂志之所以能说到做到,始终如一地竭诚为读者服务,奥妙就在于“时时刻刻”想到读者,而不是有时想到,有时忽略。

拿杂志的内容安排来说,自然要配合中学课程,提供各种补充材料。这本是中学生的需要。但杂志是一种课外读物,属于可读可不读的范围。为了吸引读者,让他们愿意读,喜欢读,杂志上的文章必须避免呆板沉闷,力求生动活泼,尽可能采取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。另外,中学生的年龄、水平并不划一。杂志不可能给读者分班级,必须努力做到深入浅出,让低年级同学看得懂,能接受,高年级同学读了也有收获。为了达到以上要求,夏、叶先生身体力行,做出了很好的榜样。他们两位合著的《文心》,用故事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,从语法、修辞一直讲到文学欣赏,在不同层次的中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其他先后参加《中学生》工作的前辈编辑如丰子恺、顾均正、徐调孚等先生也都发表过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,为《中学生》的文风定下了良好的基调。

主持《中学生》的前辈编辑们本身都是教育家兼作家,这对于体现杂志的宗旨,形成杂志的风格,有许多方便之处。但要办好一个杂志,还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作者共同努力。在这方面,《中学生》也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。除了在约稿的时候强调说明读者对象,反复宣传杂志的宗旨,讲清写稿的要求

之外，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例如有一次发表专辑《答中学生杂志社问》，前边附有编者恳切的吁请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假若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”。这不仅使作者下笔时更有针对性，也使读者读起来倍感亲切。

杂志的有利条件是可以供读者利用空隙时间阅读，便于灵活掌握，既可分几次读完，又可反复重温。《中学生》是期刊，每月和读者见面，可以适当地按照学科设置专栏，约请对该学科有专长的作者执笔，分篇逐期发表，象讲座一样，循序渐进地讲解，帮助读者获得系统的理解。《中学生》的许多老读者曾把杂志当作第二课堂，把一些作者当作没有见过面的师长，读者与读者之间即使素昧平生，见了面也跟老同学一样亲切，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，都得之于《中学生》杂志。对编者来说，也是一种安慰。

中学时期，又是告别童年之后，走上社会之前的一个人生阶段。中学生对现实中的种种事象充满好奇，富于幻想，但缺乏辨别力，容易冲动。他们需要忠实的顾问，帮他们解决疑难，指导前途。《中学生》杂志就要当他们的顾问，除每期在“卷头言”中发表言论外，还设有“通讯问答”、“读者之页”，和读者直接对话，注意思想启发。

正因为社会现象会在中学生思想上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映，每当社会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期，中学生思想上的反映就更为强烈，他们在各个时期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必定随之不同。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敌寇入侵，国土沦丧，广大群众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中学生自不例外。那时候青年中流传过这么一句话：大好河山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。《中学生》杂志也不得不内迁桂林，改出用土纸印行的战时半月刊。在这种情况下

下,内容的着重点有所转移,先是宣传团结抗日,后是宣传反法西斯斗争和新民主主义,抗战胜利后又加强了反内战、争民主的内容,思想政治学习的分量逐渐增加,和创刊时的方针显然不同。这不仅是中学生读者的需要,也是时代的需要。一个杂志若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,是没有生命力的。

我参加编辑工作的一段时间,反内战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正处于高潮。我亲眼看到叶、傅两先生怎样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。记得在这以前不久,国民党党棍潘公展曾警告《中学生》杂志不要多谈政治,叶、傅先生都不予理睬,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表现了凛然的正气。还记得1947年南京学生被军警打伤的“五·二〇”惨案发生时,《中学生》6月号已经排校完毕,叶先生特地赶写了一篇《南京事件》,支援学生的正义斗争。这篇文章作为特急稿补入当期杂志,6月初就让读者看到。对于月刊来说,反映可算迅速了。

叶先生说:“出一种杂志,标明是月刊,每月某一天出版,这就是与读者诸君订了约。按月如期出版,那是守约,读者可以享受如期展读的快感。如果出版延期,那就是失信,读者就将因盼望不到而失望。我们深知守约是人间的起码道德,使多数读者感到失望也是我们自己深切的痛苦……”说得多么情真意切!它要求我们当编辑的人真正向读者负责。为了使杂志如期出版,就得提前集稿,提早排印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,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,光做到这样是不够的;另一个方面是要配合形势,及时满足读者的实际需要。如上所说为支援南京学生临时调动版面,补进文章,而又不使杂志脱期,倒有点象编报抢新闻搞“突击”了。

一般认为,《中学生》杂志政治态度比较稳健。如果和《文